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1993

4

丛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1993
4

第10期

I206.6
<1:57>

1076596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4



20163085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版式设计：吕 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三年 第四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8号

邮编：100081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SN 1003-0263

刊号：CN 11-2589/I 定价：4.5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3年第4期（总第57期）

目 录

• 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 •

-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李 杨(1)
-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发展过程论析.....张学义(21)
李寅虎

• 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 •

- 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王家平(40)
- 周作人与佛教文化.....肖方林(54)

• 现代小说研究 •

- 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董炳月(66)
- 从“惘然”到“惆怅”：
试论《上元灯》中的感旧篇章.....[香港]陈国球(83)

• 现代戏剧研究 •

- 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 胡润森(96)
袁牧之和两个角色的喜剧 张 健(107)

• 现代诗歌研究 •

- 生命的风旗：论冯至《十四行集》 张同道(115)
林徽因：澄明的生命之灯 刘思谦(137)

• 现代散文研究 •

- 杂文家的聂绀弩 姜振昌(163)
论钟敬文及其隐居纪游之作 姜静楠(183)

• 现代文学批评研究 •

- 钱钟书与比较诗学 胡亚敏(201)
从一个窗口看田仲济先生 蒋心焕(209)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 •

- 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 [香港]王宏志(221)
——几个论点的商榷 [香港]王宏志(221)
日本中国新文学研究团体介绍 (234)

· 资 料 ·

战友·文友·畏友

——苏曼殊与陈独秀····· 王建明(244)

沈从文谈《现代评论》····· 马光裕(整理)(261)

庐隐致王礼锡的一封信····· [香港]杨玉峰(262)

关于《也谈叶鼎洛》的补充····· 柯文溥(265)

· 书 评 ·

稳健与拓新：一代学者的历史品格

——读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 吴健波(266)

纵横驰骋 勇于探索

——《现代文学纵横谈》略评····· 杨占升(272)

评张健生著《艺术创作的深度表现》····· 吴小美(276)

整合·还原·沉潜·思变

——评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张清华(283)

论中见史 史中识诗

——评《中国现代诗论40家》····· 鲁 原(288)

一部鲁迅研究的力作

——评卜君林著《鲁迅的文学批评》····· 姚 健(292)

一种“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思路

——评《觉世与传世》····· 朱晓进(296)

归纳法的得与失

——读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 吕 京(302)

· 动 态 ·

伊藤虎丸访问文学馆(秋水, 53) 台湾葡萄园诗社访问文学馆(秋水, 208) 田仲济杂文研讨会综述(鲁文, 307)

· 新 书 林 ·

延安文艺精华鉴赏(秋水, 162) 中国现代诗论要略(京, 275)
刷新与循环(京, 291)。

1993年4—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推荐目录……………(311)

1994年邮购征订启事……………(136)

编后记……………(313)

重 要 说 明

- 一、由于新华书店的征订数迟迟没有回到出版社, 所以今年《丛刊》一、二期八月才印出。许多订阅者来信询问, 未能一一作复, 敬请原谅。
- 二、本刊容量有限, 来稿以万字左右为宜, 短稿优先。两万字以上的稿件和未经删节的硕士、博士论文, 不便审阅、采用, 作者最好删节后惠寄本刊。
- 三、《丛刊》今年1—3期封面同时印刷, 由于开印前没来得及校对, 本刊责任编辑董炳月的名字在第一期被错印, 第二、三期被漏印, 特此说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

李 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是解放区文学出现了叙事文学的繁荣。这种繁荣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不断扩展，构成了40—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艺术方式，这一艺术形式直至50年代后期才开始逐渐衰落，而为抒情文学所取代。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主要体裁，这一时期的优秀小说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赵树理）、《暴风骤雨》（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高干大》（欧阳山）、《风云初记》（孙犁）、《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林海雪原》（曲波）、《小城春秋》（高云览）、《三家巷》（欧阳山）、《红日》（吴强）、《保卫延安》（杜鹏程）、《铁道游击队》（知侠）、《苦菜花》（冯德英）、《铜墙铁壁》（柳青）、《战斗的青春》（雪克）、《创业史》（柳青）、《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政治委员》（刘白羽）、《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

这一时期优秀的诗歌也基本上是叙事诗。有《王贵与李香香》、《菊花石》、《杨高传》（李季）、《漳河水》、《圈套》（阮章竞）、《赶车传》（田间）、《王九诉苦》、《死不着》（张志民）等。

戏剧作品也以叙事为主，如《白毛女》（鲁艺）、《茶馆》（老舍）、

《豹子湾战斗》(马吉星)、《洪湖赤卫队》(湖北省实验话剧团)、《江姐》(严肃)等等。

熟悉当代文学的读者不难发现,以上这个名单几乎包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范畴内的所有优秀叙事作品。为什么是叙事文学,而不是抒情或象征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在其著名著作《政治无意识》中提出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经引起中国批评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杰姆逊指出:“在某种既定的艺术过程及其一般社会结构中,共存着不同的符号系统,它们所包含的指定信息之间的主导矛盾,就是所谓的‘形式的意识形态’”。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这种意义上,“形式是作为内容来理解的。”^①

研究“形式的意识形态”,关键在于指出艺术形式的演变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任何话语的产生都有它的权力基础,因此,由“五四”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纷呈、形式各异的景观在《讲话》后不复再现,叙事文学成为唯一的主导形式。这一文学形式的变革无疑有着它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一时期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本身带有叙事性,它的主题在于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

这是流传数十年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作为一个现代的发问,它摆在了所有中国人的面前。它的目的在于找出“我们”的性质,而要找到“我们”的性质,就必须设定“他们”——“我们”的“敌人”。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篇真正拉开现代中国帷幕的文章。这篇文章以“阶级”这一现代性概念对

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第一次全面地设定了“我们”与“他们”。“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③

非常明显，在这里，“他们”是西方的影子。这些敌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的性质在于“勾结帝国主义”，他们是西方在中国的工具，是西方的象征。

这个时候，“他者”无疑已经存在了，问题是如何以他者的眼光看出“我们”的本质。这不是个人的本质，因为西方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仅包括西方自身在内，而且还可以包括在非西方的西方势力；因此，与西方相对的，只能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的概念。

因此，必须把“中国”造出来，将处于自然状态、纷纭复杂的传统中国社会讲进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故事中去，也就是说要找到“中国”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时候叙事就开始了。

竹内好在谈到现代性的问题时曾指出：“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④在西方世界化的过程中，非西方的本质——主体性实际上是被西方“看”出来的。西方来到非西方时，正处在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所以需要造出“东方”、“中国”这些概念，在这种基础上，他们才可能找到和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这正如白培德指出的：“没有东方、西方就不存在了。”^⑤因为这个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东方国家性质的研究成为了西方人类学的基本课题，许多西方学者、传教士写下了以“中国的国民性”与“日本的国民性”为标题的许多著

作——他们要造出“中国”、“日本”、“东方”来。杰姆逊在谈到这个过程时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只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制度里的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工作着的努力的一部分。

对西方的物质与文化入侵，非西方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在这种关系中，非西方在历史上是不可能有主体性的，它在论证自身时必须使用西方的话语，“虽然东方一直在进行对这种剥夺的反抗，但反抗本身又包含着一种危险。如果你要以西方的话语反抗西方，你就是又一次把它确定化了。问题在于你非用它不可！”^⑥

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要反抗西方，就必须组织起“我们”的性质，即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一个现代国家的组织过程，就完全是一种认同西方的过程。非西方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只能采取西方式的手段，使国家成为主体，国家承认每个人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的确认又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普遍性为目的的。

造出“我们”，实际上就是造出“中国”来，即找出“我们”的共同本质，只有找到这个本质以后，个人的生存才会具有意义。

这个抽象的共同本质就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与古代的国家意义是不同的。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它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的国家不同的是，它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一个概念。现代国家的组织过程是十分抽象的，它的存在特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所谓“普遍同质领域”。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分为三个大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而在“客观精神”中又有三个阶段：抽象法，道德和伦理。国家是在“伦理”这个阶段出现的。“伦理”的本质决定了国家——现代国家的本质，“是自由的理念”，“是调整个人生活的力量。”^⑦ 国家是这种理念的现实，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⑧

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产生于法国和英国。

现代国家通过一个很长的孕育过程，通过法国革命出生到人间，并且由编写了身份卡片的黑格尔命了名。与古代国家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国家建立在整体性不是建立在土地和地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抽象的权力基础之上，这种抽象的权力又被一种实际权力——军队变得具体化了。

在法国革命中，通过以判国罪砍掉了国王的头。革命者使这个国家脱离国王个人。他们粗暴地把国家与自然分开，把抽象与现实分开。不可能再有人说：朕就是国家。在法国革命的混乱后，在这个混乱中出现了新的秩序——拿破仑建立的国家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国家，这个具体的抽象，除了在哲学里存在，不可能在它自身和通过它自身存在。

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尽管以向往自然状态著称，但对国家的信念同样不可动摇。他认为，“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的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与他们本身以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动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⑩

由此可见，在卢梭看来，公民应该失去其自然性，通过消除他身上的那些能使其个体独立的自然素质来改变其生理生命。也就是说，应当把“他敢于承担创建一个民族的任务”这句法国人的名言灌输给公民，以求得一种全新的社会道德特征。卢梭的公民必须是人为的，公民的美德也必须是人为的，因为只有如此，个人才真正依赖于国家这一高级的人造物。

启蒙运动以后，出现于法英的这个高级人造物不断向外扩张，通过德国，通过俄国，蔓延到全世界，到20世纪，已经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国家中了。与国家有关的概念，诸如祖国、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统一和不可分割性等等，都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共同追求。从此，国家与民族不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它依靠一种叙述而存在。可以说现代国家主义是一种思考状态，就是认为个人必须向民族国家效忠。在现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个人对其乡土、地方传承、已经存在的地域性权威力量等的依赖早就存在了，但一直到18世纪末，作为这个词的现代涵义的“国家主义”，才逐渐变成了塑造个人公私生活的公认准则。只有到了19世纪，才产生每个民族应该建立一个与这个民族分布相一致的国家这种要求。在18世纪前，整个世界，一般人要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组织，社会权威或意识形态，如民族、家庭、宗族、教会、城邦、封建主等等。以中国古代为例，爱国忠君常常是一致的。

《资治通鉴》卷二九谈到西域副校尉陈汤与西域都护甘延寿谋矫诏发乌孙兵攻郅支单于，延寿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胡三省注曰：“此时已称天子为国家，非至东都始然出。”可见，在古代，至少从西汉起，人们便已把皇帝和国家视为一体了。历史地看，这种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是人民的天然尊长，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能够决定整个民族的命运，所以忠君往往就是爱国的表现，特别是在民族被压迫和国家被侵略时，由于封建政权已作为整个民族的象征，而封建君主又是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忠君就能够起到维护民族利益的作用，与爱国也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爱国与现代的“爱国主义”性质不同。古代爱国的事迹很多，但把这些事迹称为“爱国主义”则是近代以后的事。在启蒙运

动时代，法国与英国建立现代国家时，他们也总是谈到古代国家的意义，强调古代罗马的经典对历史了解的意义。事实上，在这里他们将古代罗马当成了一种历史现象，解释它，使这些“历史”变成他们革命的理论。这种依靠古代来建立现代的方法恰好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现代性通过古代的材料创造出来的，并不是古代就有的。

美国学者韦克曼比较过这种现代国家与古代中国的区别，他指出古代中国的国家虽然是一统天下而不是混合而成的，但是它的独立性程度还没有达到一块磁铁的程度。“皇帝的任务在于德化，而不在于政治上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扩大道德力量的领域以便在适当场合改造他人的责任。”^⑩

“社会”和“现代性”范畴实证意义的互解，也导致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表象的可靠性的怀疑。正如“社会”和“现代性”为欧洲资产阶级产生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配备了空间和时间上的自我规定形式，“民族国家”也在现实法权和文化表象之间，为它们开辟了最终的会聚场所。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国家”是“社会”和“现代性”的最终表达。非但作为人际组织原则的“社会”把“个人”从诸如家庭、种族等传统社会组合中剥夺出来，迫使他们成为“民族国家”这个话语结构和经济现实中的成员，“现代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技术（discursive technology）同样也在社会经济文化生产标准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产生。^⑪

以上这段话是一位华裔学者对最近在美国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的述评中的一段。其中谈到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自爱德华·赛伊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站在非西方的角度非常严厉地批判了19世纪的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东方塑成想象中的东方为所欲为而震撼了美国学术界以后，近年来，对“东方”与“国家”话语性的了解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化批评家的共识。

“现代”本身是从“创世”开始的，因此，“创造”是现代的同义

词。现代意味着主体对历史的创造，但要成为创造者，必须首先拥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创造只能是历史中的创造，而个人要找到在历史中的位置，必须通过国家才能实现，必须首先找到国家的位置。因此，对于所有非西方而言，在进入创造之前，必须首先建立起国家。如果说创造意味着一种抒情，就必须首先通过叙事来建立抒情的主体——国家。

巴赫金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时间，它还是一种国家历史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先确定自己的国家概念，有了国家才能确定自己的时间领域，才可能在历史逻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找到自己的本质。^⑭

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建立国家的过程无疑是对西方反抗的过程，因为非西方是通过以西方为“他性”——“敌人”的方法来建立国家的。这无疑是一种反抗，一种对西方挑战的反应和反抗，但又是以西方话语对西方进行的反抗。

现代的国家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化都是在英、法两国发生的。英法一旦开始现代化，建立了官僚制的民族国家，世界的其他国家就算只为了自卫，也被迫跟着改变不可。没有国家主义就演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得那么快速。

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争，而战争直接推进了科技和经济的进展。国家需要金钱来支持这些战争，也就迫使国家将自身结构进一步效率化。对战争工具的物质上的需求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在攻防上需要有效的武器刺激了工业和发明。

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这种对西方的反抗。美国学者艾恺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称为“文化守成主义”^⑮。对国家进行一种谱系学的分析，就会发现所有国家的这种话语性，当然，这种话语

性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元话语——“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关系之上的。西方总是需要不断造出东方来确认自己。在18世纪末期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性展开的时候，最早的西方只包括启蒙运动的真正母国——法国和英国，而在现代性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非西方不断通过以这个西方为他性使自己进入现代，到20世纪末，“西方”才扩展成今天这样的庞然大物。

最早受到“现代”冲击的是德国。当时的德国被普鲁士王国统治着，整个国家被分裂成许多小邦，由三百个自主的君主和一千五百个半自主的君主统治着，对发生在法国与英国的变革置若罔闻。直到普法战争中法国打败了普鲁士国，德意志被拉入到一个“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真正落到了德国的头上，只有国家才能使德国人具有一种本质。造出一个现代国家，成为启蒙逻辑展开的第一步。

黑格尔的哲学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哲学是建立在思想万能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国家”这个概念也建筑在文化和知识的力量基础之上。在《法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宣称国家的发展对促进公民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不是为公民而存在，是公民为国家而存在。国家观念成为了正在崛起的这一代人的中心思想，这种理想就是由作为活生生的机体的国家去实现它所有公民在情感上的要求。在当时的青年人中所进行的无数次关于哲学、神学和美学的争论中，国家和它改革的必要性一直是这些探讨的要点。这些争论为国家思想的发展做了准备，对今后的德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位黑格尔式的革命者拉萨尔曾大声疾呼：“你们不要诽谤国家！国家，它就是上帝。”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艾恺谈到过一个非常奇怪而又是非常合理的现象，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大都是从最早的启蒙主义转变过来的，他们开始都是英法的崇拜者，继而都变成了英法文明的激烈反对者。^⑭这种转折